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 财富分配原理的 研究

〔英〕威廉·汤普逊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  
财富分配原理的  
研 究

〔英〕威廉·汤普逊 著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 最能促进人类

〔英〕威廉·汤普逊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6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326千

印数 5 000 册

印张 15 3/8 插页 4

(60 克纸本) 定价: 18.00 元

2833/15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5年10月

## 原 编 者 序

从本书第一册问世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当时,它可以说是一部在出版前就已寿终正寝的著作。那个时候,人们在思想上还没有接受书中这些先进学说的准备。当时人们一般都认为(现在仍然这样想),对“最能增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则”进行探讨,并不是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那一类作者的任务<sup>①</sup>。他们的研究目光还完全没有达到如此通情达理、如此远大和崇高的地步。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财富或资本的积累,特别是大量积累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幸福问题仅居于次要地位。他们只满足于揭示那些曾经支配或者现在还在支配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法则——也就是说,曾经维持或者现在还在维持着暴力和欺骗王国的那些法则;因为迄今以来,人们生产、交换和消费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享用品和奢侈品,一直是处于暴力或欺骗、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影响之下的。固然,经济学家们有时也大胆鼓吹一番,主张消除一些不利于他们所说的“财富自由发展”的障碍,以改善社会生产事业的经营方式,诸如取消直接规定的或者由于颁布某些财政法令而引起的垄断、奖励、禁令和限制等等。但是,只要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

---

① 前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西尼尔先生说:“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我所要研究的不是幸福而是财富;我不但有理由省略,而且也许必须省略掉一切与财富无关的考虑。”

根据错误而邪恶的“个人竞争”原则——孤立和互相敌对的原则——进行的，他们所夸耀的这些改善就无异于天平上的灰尘，丝毫不起作用。只要这种主要的罪恶——这种野蛮的本质——存在一天，人类的生活状况就休想有什么重大的改善。试看在被认为最文明的国家里，这种罪恶究竟造成了什么结果？对于群众说来，是无休止的从事着消耗生命的沉重劳动，而所得到的却是连最普遍的生活必需品也感到不足的供给、极端的愚昧无知和不得已的犯罪行为。当他们在时常再现的农业或商业萧条中陷于失业时，他们就只能在济贫院、监狱和坟墓当中选择一条道路<sup>①</sup>。

对于中等阶级来说，个人竞争的社会制度使他们不得不长年

---

① 可尊敬的西德尼·戈多尔芬·奥斯本牧师在 1848 年 6 月 2 日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说：“劳动者一直处于无知状态，对一切社会享受或者勤勤恳恳的独立谋生都抱着低级动物的漠然态度；他们已经如此长期地处于这种状态，以致我们必须用巨大的和耐心的努力才能唤醒他们，使他们离开家乡去寻求公平待遇，而不困居于定居法强迫他们居留的地方，不困居于那些人口充塞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能摆脱的环境滋生着罪恶，他们的劳动价值则为他们无力抗拒的原因所贬低。”

\* \* \*

“长期而痛苦的经验使我相信，用自己的血汗勉强换一口饭吃的人所处的地位，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他的家乡——英国、快乐的英国(?)、基督教的英国(?)、工业策源地、博爱主义温床(?)的英国——更坏。根据我最近的、时间非常近的亲身经验，根据我从远近各处我可以信任的人们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根据我所认识到的和得自绝对可靠来源的事实，一切都使我相信，在我国成百成千的乡村中，人民的社会状况低于我在书上所曾读到过的任何国家的乡村状况；罪恶的增加之快和性质之严重真该为我们招来任何最可怕的天谴；劳动者被骗去工资、被压迫、被虐待的种种情况对于我们国家的声誉来说真是一种耻辱。”

\* \* \*

“假使政府能听从谏言，愿意勇敢而开明地努力帮助那些打算去澳大利亚的家庭，我能够指出不止一处需要它注意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如果政府能给予这种帮助，对于自爱和愿意勤劳工作的劳动者就将是一种莫大的恩惠。这将不仅使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了希望，而且能让他们使自己的家庭脱离宗教史与世俗史上所未有过的罪恶渊薮(我随时可以这样证明)。”

奔走，焦心劳神，经常在最窘迫的经济情况下为维持“体面”而拼命挣扎。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对他们的知识和道德品质，我们能指望些什么呢？这些东西已经被伤心地压抑下去了。一切慷慨的和高尚的情操，都为竞争中的讨价还价——永远想贱买贵卖——造成的狡猾自私的卑劣心理所代替了。

在那些财富最多的上层阶级中间，现存制度的影响表现为他们经常有一种不安全感，经常担心政府会发生剧烈变化，从而造成即使不是财产上的、也是权势上的损失。此外，出身高贵、地位显赫的旧贵族对于只是以金钱取胜的新贵族——中等阶级的百万富翁，也怀有一种病态的嫉妒心理。

这就是现存制度对于通常构成“社会”的三大阶级的影响。把它叫作“社会”，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因为它并不是许多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在一起，而是一个利用彼此的无知和无助状态而互相欺诈的离奇集合体。它不是一种明智的、科学的协作，而是一种粗暴的、笨拙的聚集——不是象被强大的化学亲和力聚到一起的许多原子那样，构成一个有规则的谐和体，而是象一些被机械力强拉在一起、互相排斥的粒子那样，形成一个无组织和不调和的聚合物——总之，用一位当代知名作家简洁有力的话来说，它不是秩序，而是“无政府状态加上一个街道警察”。

但是，为什么人们要容忍这种局面呢？是不是说，以我们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还不能作出周到的安排，实现一种使所有的人都利害相关、祸福与共的合理社会制度呢？是不是还缺少生产手段——假定它们组织得很好的话——能够为所有的人生产出极其富裕的财富（也就是生活必需品、享用品和奢侈品），并使人们有足够的闲

暇时间来高度培养自己的才智和道德品质、养成最高尚的习惯和趣味呢？任何自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略具知识的人都不能否认，不管过去是什么情况，以目前世界上各个文明国家的情况而论，在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给它们的巨大帮助之下，它们完全有条件在物质财富方面充分满足本国人民的合理需要。而且在做到这一点时，还不必象现在生产不充足的供应品时那样痛苦，那样不断的劳累、焦虑，以及其他种种不愉快的情形下工作；事实上，它所需要的只是在愉快的条件下进行适量的劳动，而这种劳动正是一个人保持健康和充沛的智力、体力和精神面貌所必需的。在最近半世纪期间，这种生产手段的巨大增长已经达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而人们或许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富有发明和改进的匠心。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苦恼，不是我们不能创造出足够的财富，而是在创造出财富之后，由于恶劣的人为制度，不能对它们进行有益于资本家的处理，结果使生产者陷于失业，流于饥寒或窃盗，或者漂泊到地球的另一面去，而不能作出合理的安排，使他们为自己的福利而生产、消费和交换他们的剩余生产品。社会正在极其愚昧地花很大力量救济贫民和惩治罪犯，而利用这些力量却可以绰绰有余地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能够短时期内逐步而完全有把握地消灭贫穷和犯罪（通过消灭造成这两种现象的原因），并且能够使所有的阶级都过一种比以前任何一个阶级所曾享受过的处境要好得多的生活。

我们再说一遍，任何一个彻底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我们有力量——如果把它们很好地组织起来——既生产出丰富的物质财富，而同时又能使全体人民有充分的闲暇和机会来养

成优良的习惯和作风,获得最有用和最有意思的知识,培养和享受最高尚的趣味——总而言之,成为有高度才智、德行和幸福的人。

但是,我希望谁也不要认为,不对现存社会的各种原则和实践作一次彻底的革命,就能达到这样美好的境界,不过,这种革命将在有关各方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和平而有秩序地进行,因为暴力是和未来的新制度准备用以指导生活的精神完全相抵触的。

社会改良家坚信一条颠扑不破的救世真理,这就是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在任何情况下,在一个人一生中的任何时期,人的性格都是由他的身体本性和外在环境(大部分是他所能控制的)对于他的身体本性所起的影响形成的。所以,社会改良家对于一切人的信念、感情和(出于必然的)行为都怀有极其深厚的同情,因此,他经常不懈的努力目标,就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消灭掉那些造成弊害的外部环境,而完全代之以对人类有益的环境。他摒弃一切强力的谬想,因为那些东西无助于他的神圣事业。他用真理武装起自己,挺身而出和错误展开斗争,只是依靠道义上的劝告和仁爱精神,把它们当作能够实现这样一种如此光荣和神圣的革命的唯一手段<sup>①</sup>。

---

① “他们(社会改良家)习惯于把人类的一切事务都视作一种演进过程,所以既不冒进,也不停顿。指导他们的并不是那种模糊的政治认识,就象熹微的晨光那样,只能照亮他们勉强向前迈步,而是他们愈向前进,境界就愈趋开朗,花花世界,景象万千,听凭他们海阔天空地一往直前。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具有冷静和坚毅的特征。他们相信罪恶并非根源于人而是根源于周围的环境,不是出自人们的本心,而是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够,所以他们对任何人都不绝望。为了消除恶德,培养善行,他们不愿用高压的皮鞭玷污自己的双手,而是从改变环境上来消除诱惑,从加强理智上来战胜诱惑。”——科尔里奇\*。

\* 塞·特·科尔里奇(1772—1834年),英国诗人,反动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

我希望我在这里简单介绍的这部杰出著作，能够帮助加速这样一种美好的改革。虽然是为了实现一切人的幸福，这种改革必定是普遍性的，它却可以逐步进行——从一切国家中最需要这种改革的那一部分人，即身体健全的穷人身上开始。

令人高兴的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有名的“实业钜子”——正在一天比一天增多，也一天比一天更认真。本书的编者在它最初出版时，就深知在它所论述的重大题目上，这部著作是如何有助于人们形成编者自认为是正确的信念，因此他希望别人也能同样从中得益。为了尽量方便读者，编者在这一版把原书缩减了三分之一左右，并且相信不会因此对原书的价值有重大的损害。

毫无疑问，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将会欢迎本书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因为这些部分为他们的各种孤立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例如，作者大胆揭露了奴隶制度的罪恶，揭露了它在财富生产和传播人类幸福上的成就显然不如自由劳动所起的作用大，这自然会引引起反奴运动拥护者的重视；又如，作者在第一章第十二节中讨论了“自愿交换”问题，对于摆脱了一切津贴和禁令、鼓励和限制、不受任何束缚的“自愿交换”制度的优越性作了精湛的说明，这当然会为“自由贸易派”所乐意接受。主张不分宗派实行普及教育制度的人，也一定会十分欣赏第四章中的透彻论断——论“知识的获得和传播是提高生产和增加享受以及使分配的自然法则获得巩固的一种手段”，特别是论述在成年以前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的第四节。

作为孤立的各个部分来看，这些无疑都是最好的文章，但我们要向读者指出的是，在我们看来是本书作为一个整体的那些主要

优点，这些优点可以简述如下：

第一，清晰而合乎逻辑地规定了若干重大的根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为谋求人类最大幸福，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所必须遵守的。

第二，说明了在个人竞争制度下，这些原则能实行到什么程度以及能取得多大成就，并指出由于这个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弊害，就是在最自由和最良好的形式之下，要实行这些原则也必将归于失败。

第三，说明了在生产上实行互助合作，在财富和享受资料的分配上实行自愿平等这种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指出这种制度不仅在财富方面而且在其他每一种幸福来源方面，都远远优越于迄今存在过的任何社会制度。

第四，说明了这样一点：只要社会上已经积累起的资本就会被用来破坏分配的自然法则，剥夺生产者享用其劳动产品的权利；所以，在财富分配的问题上，明智和博爱的伟大目标应该是，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成为资本家兼劳动者，成为共同幸福的贡献者，并且为此设想出一种安排，在这种安排下，既可以顺利实现上述伟大目标，又尽可能不给任何人带来不便——这不仅对于已经积累起的资本所有者是如此，而且对于那些目前只是生产劳动者的负担同时对他们自己也很少有好处游手好闲者也是如此。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

“不管人们设想这种伟大改革会带来什么不便，和它所造成的福利相比，这些不便是算不了什么的。不论是什么政治变革，只是

在具有实现这一伟大改革的明显趋向时，它们才是有益的。本可以不堕落而堕落了的人类——没有知识、没有安慰、没有相互关心的群众——向正义要求这一改革，而从那些自认为是特权阶级的人们的真正利益来看，几乎也同样要求有这种改革。”

在结束时，略说几句关于作者本人的话。汤普逊先生是爱尔兰人，秉性宽厚、仁慈，心胸开阔，而又特别勤学。他一生中有很大大一部分时间都用于研究政治、道德和社会哲学，其中有几年曾从学于有名的杰里米·边沁<sup>①</sup>，并和边沁住在一起。除了写成于1822年左右的这本著作外，汤普逊先生还写了很多和本书性质相类似的作品，其中的主要几种曾以下列书名出版：

《人类一半(妇女)为反对人类另一半(男人)使她们在政治上、从而在社会上和家庭中屈居奴隶地位而发出的呼吁——对米尔斯先生的名著〈政府论〉中一段话的答复》，伦敦郎曼图书公司，1825年版。

《有报酬的劳动。劳资权利的协调，或怎样使劳动者得到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伦敦亨特—克拉克图书公司，1827年版。

《根据互助合作、共同占有、平等劳动和平等分配生活享受资料各原则，迅速而经济地建立公社的具体建议》，伦敦斯特兰奇公司，1830年版。

作者对于他的信仰抱着真正热诚的信念，对于人类具有慈爱

---

<sup>①</sup> 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

的精神,这一点可以从下面这件事上得到证明:他在1830年立了一份遗嘱,把他的大部分财产——他在科克郡的世袭地产——交给遗嘱执行人(编者是其中之一),用以进一步宣传他如此长期和如此有力地鼓吹过的原则,并帮助较贫苦阶级根据这些原则从事的任何实际活动。

在他立这份遗嘱的时候,公众对于尸体解剖正存在着一种最强烈的偏见。除了靠偷来的尸体以外,我们的解剖学校就只能使用被处决的罪犯尸体。汤普逊先生感觉到这是一种极大的社会弊端,所以在他的遗嘱中插入这样一段:

“为了活人的利益对于没有感觉的尸体进行解剖检查,是一项造福于人的工作,而且对于解剖者说来,这是不愉快的并且往往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人们对此却怀有愚昧的、并且时常是十分有害的偏见。为了克服这种偏见,我决定在我去世后,把我的尸身捐赠给一位解剖学讲师进行解剖检查,条件是解剖者必须把骨骼以原有的或者整理过的形式交给人种与比较解剖学博物馆保存,——正如我的藏书等遗物交给不列颠或爱尔兰第一个成立的合作公社图书馆保存一样。”

汤普逊先生于1833年3月28日在科克郡罗塞伯利地方克罗恩金自己的家中,因肺炎病故。他在逝世前二十年中就一直素食戒酒,据他告诉编者说,他所以这样节制自己,主要是因为慎重地考虑到他的身体在这些方面的需要,同时也因为这样可以使他更好地从事思想探索和著作活动。他的患病时间很短,可是他敏锐地预感到了自己行将去世,所以在死前几天里,能够由于这种预感而

有所准备；他写信给他的几个朋友，就他长期来所关心的伟大事业作出了种种安排。关于解剖他的尸身问题，按照他的遗嘱执行了，虽然并不是没有遭到邻近无知农民相当激烈的反对——几乎激烈到动武的程度。可是他的遗嘱执行人却没有能办到遗嘱中提示的其他各点。死者的一些亲属对于遗产的处理问题提出了争议，于是引起诉讼，案件送到了办事最拖沓、花钱最多的法庭——爱尔兰最高法院里，直到现在还未解决。

写于都柏林郡的克郎塔夫

1850年8月

## 作者前言

迄今以来，一切考察、研究政治经济学及其有关各学科并在这方面有所著述的人，都可以被分为两派——精神学派和机械学派。就晚近时期我国的情况而论，在精神学派的玄想家或哲学家当中，突出的人物是《政治正义论》的作者葛德文先生<sup>①</sup>。在机械学派的理论家当中，同样有名的是马尔萨斯先生，特别是他的早期著作《人口论》几乎已经成为一派政治经济学家的教科书。

精神学派的玄想家们，由于他们切身体会到同情心和文化素养带来的那种永不枯竭的，令人感到满足的和高尚的喜悦，由于他们本身的物质需求全都得到了愉快的满足，从而使这些方面很少引起他们的注意，由于他们感觉到自己能够自我克制，压抑在他们看来是我们天性中比较粗鄙的那些癖好，或许还由于他们很少注意研究自然界的物质规律、研究人及其周围各种生物的物质本性，——由于这一切，所以他们宣称人只要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差不多不必凭借物质的从属作用，就能够得到幸福。他们把人体组织的思维部分提到了如此优越的高度，以至认为人们今后如果能充分发挥思想的作用，就可以不必依赖通常用来促进健康的物质手段，而纯凭意志力量保持自己的健康。他们认为心灵不用物

---

<sup>①</sup> 威廉·葛德文(1756—1836年)，英国急进作家，他的代表作《政治正义论》对资产阶级贵族的剥削所有制进行了批判，但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译者

质手段作为中间媒介，就可以支配象耕地和航海这类机械行动。至于这种神秘的过程，这种意志的奇迹怎么有可能实现，怎么能和人所公认的事理相符合，当然是无法解释的。

不论人类在谋求社会幸福的技术上可能有什么进展，这些都要归功于他们对周围物质世界和他们自身的广泛了解和细致认识，归功于对这类物质存在的明智的利用、分配和制约。但是，属于精神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们，却希望人的思想就是一切，他们自命不凡地把劳动看成是机械的和下贱的事情，忽略了功利这个最高原则，这个只有根据它才能判断一切事物有无价值的原则。思想是什么呢？不过是人们头脑中产生和被感觉到的活动而已；劳动又是什么呢？劳动就是传达给自然界永远活动着的力量并与这种力量合作的活动。除了比较这两种活动产生人类幸福的趋势大小以外，还有什么标准能衡量哪一种活动更优越呢？

如果说我称之为精神学派的那些玄想家们过于忽视物质和物质力量的作用，那么，我称之为机械学派的那些理论家们，则正好采取了另一个极端。据他们看来，人这种生物根本就没有什么理智力和同情心；他不过是一个机械的东西，就如同他与之合作的耕犁、织机或马匹一样；只有用对其他动物起作用的那些粗暴手段，才能促使他劳动。那些自称为纯政治经济学家，声言除研究财富问题外别无其他目的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属于这一派。他们对于智慧、仁慈、互助合作和可以达到尽美尽善境地的可能性这些崇高的观念，都一律加以嘲笑。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作出这样的安排，使机器——不论是用食物和空气发动的活机器如牛、马、人等，或者用蒸汽或水来发动的死机器——尽可能多地生产出食物、衣

服、房屋以及各种优雅的或者随心所欲的消遣品等等，另一方面，则是想出各种办法来找到足够的消费者使用生产出来的这些物品，以便每年都能够继续保持对这一类产品的需求。至于这些物品是用什么方法或者由谁生产的，不管是由骆驼、马、人、奴隶或非奴隶生产的，是由沉重的或轻快的、健康的或损耗生命的劳动生产的，这些都无关紧要，除非这些死机器或活机器的耗损将提高价格或减少生产。这些物品是怎样或者是由谁消费的，究竟是由广大的生产者消费、让喜笑颜开的民众普遍得到欢乐呢，还是由住在高楼大厦中的少数人享用、由于过份满足而徒然浪费掉呢，这些也都无关紧要。这一派学者所关心的，只是怎样达到最高额的生产和保证最大的消费或有效需求。除去和财富或交换价值直接有关系的东西以外，这些严峻的经济学家们在推理过程中不考虑任何其他问题。在这些机械学派的理论家中间，正如在精神学派的玄想家中间一样，同一派人的意见又存在着各种差别；他们有时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一些对立学派的观点。

以上这两派研究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幸福问题的理论家（他们被作者称为精神学派和机械学派），没有一派能达到真理；不论哪一派都还没有设计出一种调和而有益的人类劳动制度，提出一种最明智、最健全的产品分配方法；虽然每一派在自己这方面都发现了不少真理，揭露对方的错误却是他们的主要快事。这一切难道有什么奇怪吗？他们怎么会不是这样呢？事实是，人并非仅仅是一架机器，就象一架蒸汽机或纺纱机那样，也并非一头愚蠢的牲畜，就如同供人驱使的牛马一般。同样，人也不仅仅是一个纯思想的东西，同他周围的生物和无生物没有任何共性。人是一种非常